

紅樓夢新證

中國古典文學
研究叢刊

周汝昌著
棠棣出版社出版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紅樓夢新證

全書390000字

定價24,500元

主編者	王	耳
著者	周 汝	昌
出版者	棠 棣	出 版 社
印刷者	文 明	印 刷 所
發行者	長 風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1號

1953年9月初版 0001—5000 版權所有

1953年12月三版10001—17000

關於紅樓夢的幾點理解

王耳

——周著：紅樓夢新證代序

紅樓夢是曹雪芹依據自己的生活感受，通過高度的藝術手腕，所唱出的封建貴族階級走向滅亡的輓歌。曹雪芹在一定的程度上對於他的時代，還保有某種感傷的氣息——依戀和徘徊。因此，從他這部作品的世界觀看，不可避免地流露着若干對垂死階級的悲憫情致。但是，在方法論上，無容置疑地，作者身上所滿蘊的現實主義得到了偉大的勝利。這部不朽的著作不止是描寫了一個貴族之家走向敗壞的三代生活，抑且卓越地描繪出封建貴族階級的無恥和墮落，進而明顯地暗示了封建時代的必然消亡。

正有如一切偉大的文學經典在舊中國所遭受到的命運一樣，一般說來，紅樓夢在過去蒙受到「紅學家」們的曲解是驚人的。對於那些荒謬而空疏的理解，本文實無浪費紙筆爲之介紹的必要。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因此，紅樓夢所描寫的「賈府」就不可能是離開時代社會而游離存在。要想研究或了解這部文學經典名著，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就必須從那個特定時代和那個特定社會關係的聯系中去着眼了。

這當然不是很簡單的工作，而周汝昌先生是辛勤地替這個有意義的工作，奠定了基礎。這篇小文，基本上是根據汝昌的新證為基礎，歸納出一點看法，以供讀者們參考。

第一個使我們思考的問題是：滿清皇朝攪得了統治寶座以後，第一代順治皇帝老爺是看破紅塵上了五台山，第二代的康熙大部份時間花在「勘」那些不服統治的明代遺民英雄的「亂」，到雍、乾之際，正該是全盛黃金時期，該是所謂河清海宴，頌德歌功纔是，怎麼單單在此時卻出現了一部紅樓夢呢？

從歷史看，乾隆朝不但是大清帝國盛衰的關鍵，它恐怕也還是整個封建社會由盛至衰的轉捩點。這樣說來，乾隆朝本就不是什麼「全盛」，而實在是死亡前的迴光返照，這一返照之後，再無更蘇之望，賸下的只是些微的淹留殘喘而已，歷史事實昭示給我們，這個巨大的總崩潰，是一個不可挽回的命運；其徵兆氣機，就被偉大的時代文學巨人所感孕了，「賈府」的整個敗落，也就象徵着這一巨大的總崩潰，紅樓夢之所以單單出於此時，絕不是偶然的事，曹雪芹筆下所熱愛的主人公是這個勢將崩潰的社會的逆子，他所悼惜的是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他所基本否定是那個時代的虛偽的道德。

其實滿清興亡的關鍵，若更深入地推究起來，其真正轉捩點卻還不在乾隆朝本身，而是在於它的上一代雍正，這當然是牽扯着多方面的複雜的內因與外緣的，我想只集中在一

件事情上，具體來說明它是如何地影響了清朝的政治，同時也就如何直接嚴重地影響了曹雪芹，這就是清史上有名的雍正奪嫡事件。

康熙爲了立嗣，很傷了腦筋，他的「太子」，立而廢，廢而立者再，始終不決，這就給了他其餘的「皇子」們野心覬覦的機會，明爭暗鬥，極爲熱烈。四子胤禛，人最能幹，專在他皇帝老子面前討好，而暗植實力，想奪取這個寶座。其他的胤禔、胤禛、胤禩等人爲一黨，乃成了胤禛的眼中釘。結果，胤禛因爲陰狠毒辣，實力又厚，終於用強硬手段達到目的，嗣位後即是雍正。這一來，不但他的爭嫡中的正身死敵們遭了大殃；瓜蔓株連，殘殺禁錮，也極盡苛酷慘忍之能事。他在施政上，多反他父親康熙之所爲，性既刻毒猜忌，羣臣覈棘，以致康熙後半期穰謠造成成功的「昇平」氣象一變而成混亂、恐怖、朝野惴惴的時代。總而言之，雍正的「登極」，等於是黑暗中的黑暗的來臨，在位十二年的時期，即是清朝統治中尤其黑暗的時期。直到十三年秋天乾隆即位，才又略反他父親所爲，企圖用些寬赦懷柔，來收拾人心，所以才又有了六十年的迴光返照。

這些情形，無庸多贅。至於這些事又是如何直接地影響了曹雪芹呢？我想應該分兩方面來看。

第一，這件政治大變動直接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全家和至親一黨的命運。據汝昌考證，

曹寅李煦（即書中史侯家），因和康熙有特殊的關係，極得親信，兩家在江南一帶，分別並輪流掌握着財賦要務有數十年之久。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兒子曹顥繼職，不久兒子又死，家門落得很慘，過繼侄子曹頌又繼職，全是康熙特為破格維護，這些人早不對雍正的眼，他一作皇帝，曹、李二家均失勢，後來在曹頌處查出過胤禛鑄而未明欲作何用的一對大銅獅子，於是不久丟職查問，李煦也因曾送給胤禩婢女事發而下獄。餘如作織造的胡鳳聲且全家吞金自盡，兩家在雍正時代之情形不問可知。這件大事在曹雪芹小說裏就也沒有影響可尋，第十三回秦氏既死，賈珍選棺木皆不中意，薛蟠告訴他：

我們木店裏有一副叫作什麼檣木，出在濱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裏，也沒人出價敢買……

抬來看時，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噹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按此木即「水桂」清初筆記家有記載）。獨獨賈政勸阻，說：「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在此句話旁，脂硯齋有批語，說：

政老有深意存焉。

「義忠親王老千歲」，卽正是乾隆一代人稱呼胤禛一輩人的尊號，「壞了事」明指遭禍，無人

敢買，不宜享用，深意存焉，所有字裏行間，無不流露了這層諱莫如深的隱情，汝昌曾說這流露或是有意的。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卽了位，赦釋「政治犯」，酌量復爵的復爵，加恩的加恩，這班人纔死裏逃生，曹李二家也恢復了小康局面，所以在當年大典之下，就有誥封曹宜的誥命（此命今尚存），紅樓夢所寫，即是恢復小康後的局面，與曹寅盛日相去甚遠，許多人還弄不清這一點，嫌曹雪芹若於雍正二年才出生，就「趕不上繁華了」，因而硬要把他提前出生於康熙末年，有人甚至因此走回頭路，連紅樓夢是曹雪芹所作也重新懷疑起來。單說曹雪芹出生在這個時代，他是聰慧早熟的人，一切家事國事，耳目之間，一定種下了深刻的印象，影響他對社會、對政治、對人生的看法，在他性格思想上起了一定的變化。

第二，那些「親王老千歲」們，有的幸而未死，十幾年的苦難裏爬出來，雄心都盡，意志消沉，改變了早年的人生觀，轉而走向一個不問世事，尋求解脫的道路去，就是向禪宗的「安心」幡幢下尋皈依，一時一些「金枝玉葉」，都變成了塵尾蒲團的追隨者，因為禪宗在佛教裏是迥異於世俗燒香捻珠的一支獨特門徑，極易於與貴族封建士大夫階級的高人雅士結合起來。此風一起，從者靡然，一大批宗室王公，深鑑前車，早懷戒懼，不論有意無意地，很自然地紛紛走向此路去，例如後輩的永璿（即皇六子），汝昌很疑心就是書內北靜王水滸

俗本作世榮，非是，或因太明顯故後避改，永忠，永憲，永誠等，無不在此集團之下，致造成當時上層階級的一股強有力的潮流，深切地影響着當時和後來的許多人的思想和文學。這卻正是當時統治階級內在的一個矛盾，社會黑暗的一種反映。

曹雪芹雖不是宗室，卻是道地旗人，就逃不出這個時代影響，因此就濃厚地浸染着這種思想，他書裏的許多「禪機」，脂硯齋批語裏的許多「偈子」式的韻語（尤其多存於戚本的回前總評），以至整個小說主人公的結局是「當和尚」（此和尚不是一般的「賊禿」，乃是禪門大師式的高僧，曹雪芹是最反對迷信的），都須從這一事實上認識。曹雪芹本人沒真出家，但他生前常和衲僧來往，他的朋友敦誠，敦敏，及其一黨的許多人，老表兄弟中如甘道淵，無一不是和他一樣的思想，一樣的行徑，欲研究當時的社會，這是不可忽視的一面；而欲了解紅樓夢，這尤其是不可忘記的一點。

嚴格地講，百十回的紅樓夢，前八十回的盛只是為反跌後三十回的衰，所以後三十回實在比前八十回為重要，而偏偏這更重要的三十回卻一起迷失了，雖然有人費九牛二虎，想從脂批裏爬搜些佚文遺事，可惜脂批本不是以稱引佚文為本意的文字，點點滴滴，加以揣想，正誤參半，遽認為是，已不盡然，大段重要處，直恐相去千里，這樣，便造成我們今日要企圖全面地批判曹雪芹的困難。然而我們可以確知的，賈寶玉雖然「懸崖撒手」，這部小

說卻絕非是什麼「悟性」、「證道」的邪魔書，因為這部書的結局是「情榜」，它還是「人」的事，警幻雖號曰「仙」姑，她也還是人情味的代言者，寶玉冠於榜首，得評語曰：「情不情」，這據脂硯齋一條批語說：

按警幻情講：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

可見曹雪芹是把一切無情的都以有情待之，這決不是出世的思想，因為出世法是要「覺有情」，就是要把一切有情的轉為無情。所以，說曹雪芹是出世的實實只是片面，甚至膚淺的看法。其次，紅樓夢裏一上來作者即傾心吐膽地向讀者說：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情誰記去作奇傳？

在第一句旁脂批道：

書之本旨。

「無材」，與其說是自謙的話，我看無事說是有憤之言，這已洩盡消息；更重要的是「補蒼天」，我們不該故為苛論；為什麼不把舊蒼天拆掉，另鋪一個新天，而非要去補它？我們就事論事，在過去有多少人何嘗看見「天」，更不用說看見天的缺陷了！「補」當然就更談不到。曹雪芹明明說出，他的志趣不是頂門扇，而是補蒼天！這是何等的見識與抱負！這樣

的人，難道我們還能單從「出世」的觀點去認識他麼？

正唯如是，我們就多少可以找着賈寶玉個人悲劇的社會衝突何在。

曹雪芹是有志補天的人，而受了時代的限制，只能去寫小說，這在曹雪芹就是一個不可解的矛盾衝突。而我們尤其應該認清，他寫小說時是怎樣一個政治環境，人民有多大言論自由？雍、乾諸朝的文字獄，人人盡知，而乾隆如何陰險地大規模摧殘文化抑制言論思想，也表現在修四庫全書一事上，我們今天如不能想像那個時代，就可以去看看京戲：兩個人在室內談話，談到某處，一個就必說句「禁聲」，然後二人同到門外張望四至，證實牆上並無耳朵，才敢回來接談下去，看紅樓夢就很使我們有這樣或類似的感覺，試舉幾條例子看：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甲戌本凡例）

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同上）

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第一回）（脂批於「不干涉時世」云：「要緊句」）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同上）（脂批於「傷時罵世」處云：「要緊句」）總是稱功頌德。（脂批賈政「現已陞了員外郎」）

二名二字皆頌德而來。(脂批賈赦恩侯，賈政存周)

所謂此書不敢干涉廊廟者即此等處也。(脂批賈雨村「狗情罔法」亂判葫蘆案)

略一解頤，略一嘆世，蓋非有意譏刺仕途，實亦出人之闕文耳。(脂批同上處)

爲什麼這樣反覆剖白洗刷呢？這也足夠幫助我們想像出作者是在怎樣的一個世界了。

因此，曹雪芹對黑暗政治的反抗，不得不採取旁敲側擊的方法。總之，曹雪芹不同於客觀地專寫別人如官場現形記的人，他的不可及處，乃在於忠實現實，——現實主義的勝利。因而他能，而且肯一方面從他自己的家庭中取材，另一方面卻又在一定程度內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去看問題，茲舉幾個例子爲證：

一、寫賈政「竭力內中協助」賈雨村，「題奏之日，輕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脂批在此兩次說道：「春秋字法」)

二、寫王狗兒向劉姥姥冷笑說：「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作官的朋友！」(脂批「戚」字下說「罵死」，「友」下也說「罵死」)

三、寫門子教導雨村，若觸犯了賈、史、薛、王這樣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脂批說：「可憐，可嘆！可恨，可氣！變作一把眼淚也！」)

四、寫鐵檻寺老尼向鳳姐使賄，謀硬退張金哥婚約，另嫁「府太爺的小舅子」以致金哥自縊，未婚夫守備子投河殉情，鳳姐坐享三千兩。（脂批曾說：「小人之心如斯，良民遭害如此！」）鳳姐……與雨村是對亂世之奸雄。」

五、寫鳳姐因尤二姐一事，如何先調教張華假告狀，遣旺兒假對詞，說出賈蓉，又向察院使賄，如何只用虛張聲勢吓唬，又調唆張華堅要原妻，但又使察院將張華以無賴訛詐之罪名，亂棍打出來，一面又調唆再告，一面又授意與察院如何批示，一面卻又給張華些銀子，攆他遠走，此案遂以「張華枉告不實懼罪逃走」而結，最後則又叫旺兒追上張華，務必治死。看看權門與官吏勾結的玩弄法律、欺壓貧民是有多多少少花樣吧！

六、寫賈赦因看見一個窮酸的幾把考究摺扇，欲得不可，後來賈雨村爲了逢迎，竟誣窮酸拖欠官銀，把扇子抄沒送來孝敬，窮酸因此而致死，賈赦卻斥他兒子賈璉說：「人家賈雨村怎麼有本事把扇子弄來！」賈璉回的好：「爲了幾把扇子，把人家害死，這樣傷天害理的事，也算不得什麼本領！」又借平兒口罵雨村「餓不死的混賬野雜種！」這幾條例子已經很明確地說明了曹雪芹怎樣在創作方法上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上看事情和講話了。

曹雪芹看不慣這個人喫人的世界，尤其是對於一切封建、宗法、禮教的內涵，至於仕宦

以及「干祿」式的「讀書」，他都是一體表示懷疑的。他對嫡庶、主奴、男女、良賤的封建區分也都不不能了解和欣賞，因此，在他心目中往往把更多的同情給予被壓迫的一方面，他寫他自己的階級，大段是暴露醜惡，很少揄揚，而寫下層社會，則每每在於表揚其可愛的品質，最容易使人記憶的當然是劉姥姥和倪二。另一面看，書內女子一律入了「薄命司」，這自然不是什麼「節孝聚於一門」的巧事，而是說明了這個階級的不可脫逃的命運，最可注意的是：唯一例外得救的是巧姐，卻是因為依靠了劉姥姥這個「卑賤」的人，而獲得了出路（據脂批，劉姥姥為此還有「三進」榮府的文字）曹雪芹把若干希望都寄託給劉姥姥了。雨村，鳳姐代表着統治階級，後來卻是雨村利用了而又充發了的門子（即葫蘆廟小沙彌）來歸結全書，鳳姐壓迫過的「小人物」，如上舉張華，守備家，寧府治喪時打罰了的下人，寄託在賈璉心中的尤二姐的冤魂等等；這一干受迫害者，將來也都要求向鳳姐清算（紅樓夢中極細事，極閒文，亦非虛設，後文皆有著落，如汝昌在第八章第四節所考）。

正唯如上所述，曹雪芹難為當世人所了解，受盡人們的譏嘲賤視，是必然的，這就說明賈寶玉為什麼被人目為「瘋瘋傻傻」，「胡言亂語」了，他自己說自己：「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這真是慨乎言之！

總之，曹雪芹內心的鬥爭是一方面因受時代限制，不認識可以另闢新天的道路，還要「補」那個舊的「天」，可是一方面那個天底下的封建關係亦已在其心內行將瓦解，這就是賈寶玉的悲劇，也就是當時社會衝突的反映，賈寶玉未毀滅，自以為得了解脫為出路——但在我們看來，解脫的出路本身便是悲劇，何況這只是曹雪芹的幻想罷了，在現實中，沒有這個解脫，曹雪芹沒有出路，一部小說是他的「出路」。他還是貧病而死於人間世的。

也有人把曹雪芹擬於莎士比亞，這固然也不能全部恰當，然若就上一點說，又是不無些許道理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廿九日

匆草於海上摩天樓

此文曾呈請杏兄閱，杏兄主要認為紅樓夢所抒寫的只是暴露了貴族階級的內部矛盾，作為階級鬥爭的意味，是不必強加附會的。因此，他不能同意我的論點。他認為無論如何曹雪芹並無意請劉姥姥來做大觀園的主人。杏兄的態度是誠懇而嚴正的。但，我的理解一時還擰不過來。好在這篇小文章，充其量只能是提供給讀者們作為一種參考而已。關於紅樓夢的總的認識和評價，恐怕還有待於專家們作更細緻的商榷和研究。

七月上旬 王耳附記

寫在卷首

這是一本關於小說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書。

材料不過是我們研究一個問題時需要取資的東西，考證也只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終目的。在爲了給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較爲便利的條件上，在爲了給那一工作打下一個比較結實的基礎上，材料和考證纔有它們的功用和價值。因此，在閱讀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證時，我們便不能忘掉我們的出發點，即爲了上文所謂進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爲了這部小說和這位作家的批判與評價工作。

要體會紅樓夢之所以爲偉大與博深，單看人們對它的認識演變的整個過程，也就不難得到一個很好的說明。在清代，紅樓夢不止一次遭禁遭燬，列爲「淫」書。有人甚至有過這樣異想天開的念頭：把紅樓夢傳播到國外去，拿它的「毒素」去回報洋鬼子所給予我們的鴉片毒害^①——現在看來，真不啻是「奇書」必有「奇用」，然而這正代表當時一般人對它的認識。

從那以後，到今天，我們向前邁進了幾大步，各方面提高了真不知幾千百丈。不過，我個人在目前就還深刻地感到一個事實：一部分人一談到這部小說甚至一聽見「紅樓夢」三個字，就嗤之以鼻，諷之以辭——好像這三個字本身居然就可能具有甚麼要不得的品質似的！我們可以說，這些「批評」者不但對這部小說的認識還停留在極端膚淺的階段上（實質上並未能比「回報鴉片」的認識高出多少），而且似乎連對待祖國文學遺產的最起碼的正確態度也還未建立起來。這裏我們不由地聯想到，在列寧論托爾斯泰的七篇著作之前，不是也恰恰有人認為：寫出那些包含着許多宗教思想與消極主義的作品的、出身地主階級、身為伯爵貴族的托爾斯泰，只不過是「上層階級的思想意識論者，描寫摺紳生活的荷馬」嗎？

幸而不是人人都那樣看的，紅樓夢的名字實際上是常常與水滸傳並舉，曹雪芹也久經肯定為我國許多古典文學偉大作家中的一個了。問題在，儘管如此，現時對紅樓夢的一般贊許還都局限在曹雪芹的文學技巧上，例如說他的人物典型創造如何如何，說他的敘述描寫手法如何如何，如是而已。但這只能是曹雪芹所以為傑出的一小部分，絕不是紅樓夢所以為偉大的全體。舉一個至為淺顯的點作例來說：李汝珍在鏡花緣裏以一種玩笑的態度提出一點點社會問題，就可以邀獎獲贊；曹雪芹在紅樓夢裏那樣嚴肅而沉痛地提出許多許多社會問題——宗法問題、奴隸問題、專制問題、官僚問題、司法問題、官僚地主問題、農民

問題、宗教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妻妾問題……一言以蔽之，封建社會制度下的種種問題（換言之，曹雪芹的鏡子忠實而詳細地反映了一個十八世紀中國、本質改變前夕的封建社會），然而卻從未受到過應得的重視，也少有人充分提出來作為專題討論。那麼，我們便不無理由說：無論清代的認識也罷，以後的認識也罷，以至今天我們的認識也罷，雖然它們之間有着基本的不同，有着顯赫的進步，但一個共同點卻仍然存在着，就是：一般人把這部小說的偉大都十分地縮小了——把它狹隘化了，片面化了，淺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惡劣化了！

列寧說：

「托爾斯泰能在他的作品中提到那麼多的重大問題來，能以在藝術力量上造詣到那樣的高度，這就足使他的作品在世界小說文學的最前列中佔一席之地。在托爾斯泰的天才的燭照下，一個呻吟於封建地主的桎梏之下的國家的革命準備時期情況，就以全人類在藝術發展上邁進一步的姿態而呈現於我們目前了。」

「農業俄國的一切舊的基礎的迅速崩潰，使他的觀察力更加銳利了，使他對周圍事物的關心更加深切了，同時也使他在整個世界觀上起了一個變化。以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而論，托爾斯泰屬於俄國高等地主貴族階級，可是他卻放棄了他對這種生活環境的習慣看法。」^①